

分布式杀伤是海上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

黄峻松

海军指挥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 美军在海上战争理论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为预研海上战争的发展, 充实发展中国海上战争理论, 按照“分布式杀伤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与未来智能化海上战争的关系—是否符合海上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思路, 考察了分布式杀伤在海上战争演进中的历史必然性, 表明分布式杀伤是海上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分布式杀伤对作战能力建设的要求。

关键词 分布式杀伤; 海上战争; 作战能力

集众家之所长才能自成一派, 学习国外军事理论是创造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不研究他人就无法超越他人, 毛主席也曾研读过《战争论》等西方战争理论著作。国外军事理论种类复杂、体系庞大, 从苏联的侦攻复合体, 以色列运用无人机蜂群以微弱损失打赢城市巷战, 英军网络赋能作战, 到美军的五环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等, 应接不暇。学习外军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应用于自己, 对这些军事理论不能简单的运用拿来主义, 也不能不加辨别的全盘摒弃, 而是需要考察后辩证的扬弃, 考察其是一家之言还是仅适用于某种类型的战争, 还是预示着未来的战争形态。这就要求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蔡尚思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中提出: “研究学术, 以方法为首要。方法是研究者欲达到目的地、求得目的物的一个利器, 亦可叫做手段或工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应具体地、历史地研究问题。具体地, 即实事求是的, 从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 理论与实际有多大差距的角度切入, 考察国外军事理论对我的实用价值; 历史

地, 即在时间纵向上, 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入, 考查该理论能否在历史长河中站得住脚, 即使站得住脚, 又有多高的历史地位。

国际上关于分布式杀伤的研究很多, 有以下3类。一是着眼于分布式杀伤中的某一具体能力展开分析。如李洪兴^[1]认为拥有反舰导弹的濒海战斗舰可能会成为分布式杀伤舰队的先锋。二是根据其作战样式, 畅想未来作战。李峥等^[2]认为分布式杀伤旨在降低对方对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 不仅提供有效的战斗力, 还能够提供威慑力。三是根据内涵与能力要求, 分析其在当代的可行性, 如王璐菲^[3]认为美军现有的后勤和指挥控制能力存在不足, 尚不能满足这一概念的需求; 岳季东^[4]认为, 分布式杀伤概念需要在勤务舰船上大量加装攻击性武器, 战时易成为敌方目标, 不利于舰艇自身的防护。通过对前人成果研究发现, 存在的薄弱点有3个: 一是从技术角度分析分布式杀伤与智能化战争关系的不多; 二是将分布式杀伤进行历史地考察的文章不多, 对分布式杀伤历史定位的阐述比较笼统, 并没有

收稿日期: 2017-11-15; 修回日期: 2018-01-16

作者简介: 黄峻松, 上尉, 研究方向为军事战略学, 电子信箱: 15169646801@163.com

引用格式: 黄峻松. 分布式杀伤是海上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J]. 科技导报, 2018, 36(4): 62-68;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8.04.011

从海上战略角度进行系统的论证论述;三是从海上联合战争角度分析其对海上作战能力要求的文章较少。

本研究从分布式杀伤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入手,分析分布式杀伤在海上战争发展中的规律,探析实施分布式杀伤对海上作战能力的需求。

1 分布式杀伤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及与智能化战争的关系

1.1 分布式杀伤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网络中心战

分布式杀伤是从网络中心战发展而来。网络中心战理论认为,未来战场上的环境极其复杂,任何单一的个人或组织不可能完全掌握做出决策的最主要客观前提——战场信息,因此,未来作战应该基于网络。网络中心战的实质就是基于网络的作战,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网络技术的发展被美军所重视。最初受制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程度,美军仅能够实现数据的分散收集和集中处理,分布在各地的任务部队由于无法掌握战场全局,于是将收集到的信息通过网络反馈给指挥部,等指挥部中央处理器处理完,再反馈给任务部队。但是战场信息瞬息万变,这种做法大大的丧失了时效性,于是战场信息的处理能力成为美军的瓶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分布式信息处理器应运而生,改变了以往由中央处理器单独处理信息的情况,而是由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处理器通过协作机制处理信息,形成结果,中央处理器仅进行监督提示作用。以办公室的信息处理为例,以前办公室所有成员都将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办公室主任处理,而现在,大家收集到信息后,通过相互协调对工作的整体有了掌握,形成各自的方案,汇报给办公室主任。这种统一指挥下对信息的分散收集和分散处理就是分布式杀伤的理论前提,既提高了效率,又提高了准确性,还使战斗持续力大大增强,因为中央处理器的损毁不会导致系统瘫痪。

1.2 分布式杀伤的主要实践基础是信息化条件下攻防能力发展的不对称

信息化条件下火力打击能力的提升远远大于防护能力的提升,使得分布式杀伤变得有效。近现代时期“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这是因为当时的军舰吨位过大,甲厚炮巨,面对甲薄炮小的军舰几乎是无敌的存在。而在当代,一艘1~2千t的小型护卫舰可以装备与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相同类

型的反舰、防空导弹,唯一的区别在于装备导弹数量的不同。但是2种舰艇防护能力的差距却远没有吨位和花费的差距那么大,甚至小型舰艇因为目标小还具有天然优势。这使得小型舰艇打击大型舰艇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因为2014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兵棋推演中,装备反舰导弹的濒海战斗舰使得对手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战场资源来应对这种“不起眼”的小兵力,才引出了分布式杀伤这一概念^[1],即每艘舰艇都能对敌方的主战装备构成威胁。尤其是在信息化系统的支撑下,战场上所有兵力的侦察能力与情报能力都已融为一体,小型化军舰战场感知能力的天然劣势被进一步缩小。因此,分布式杀伤得以在众多作战样式中脱颖而出,是有信息化背景做支撑的。

1.3 分布式杀伤是智能化战争的前哨站

无论将智能化战争定义为信息化战争中的一个阶段还是信息化战争的下一个阶段,智能化战争已经被广泛认可是战争的未来,其核心支撑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立足于广泛收集的海量信息,通过运算量极大的处理器分析出结果,当代海量信息的取得已基本实现,硬件难点在于超大运算量处理器的制造,软件难点在于算法的研究。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出与人类相似方式作出反应的机器,其实质是机器的自主反应,即学习能力,而学习能力必须要有强大的终端处理器,只有处理器的终端化,才能使机器实现自主。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如果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得出正确结论,机器就有了自主行动的目标;只有处理器实现终端化,大数据要求的运算能力才可以实现。分布式杀伤概念体现出的成本低、灵活性强、对抗性强等特点离不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2],分布式杀伤预示着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在任务部队分布的广阔海域里,只有有着自主处理信息能力的分布式处理器,单一舰艇发现的信息才能与其他舰艇发现的信息有机结合起来,得以分析出敌方兵力行动的结论;单一舰艇雷达发现的来袭导弹才能迅速传递给拦截范围内的所有兵力并推测出敌方的打击目标;不同位置的舰艇才能针对某一艘舰艇载入的打击目标参数推测出本舰应该载入的参数。分布式杀伤中的这些战斗样式,对处理器的运算水平、实施的算法程序和舰艇的自主反应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客观要求。

2 分布式杀伤符合海上战争演进的客观规律

2.1 “广域分布”的作战思想与经典海洋战略理论高度契合

截至目前,分布式杀伤的理论体系仍未完全定型^[7],但是就作战层次而言,是统一明确的,增加单艘战舰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并以分散编成的方式将其使用于广阔的地理空间,产生分布式的火力,以达到海上控制目的^[8]。其战略运用的核心理念是分散编成。分布式杀伤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经历过无数实战检验的经典海战理论发展而来,其思想与经典海战理论高度契合,符合海洋战略学家对未来海战的畅想。海军兵力的集中与分散不是水火不容的概念,而是辩证统一的矛盾体。

1) 与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高度契合。马汉主张,对海军集中兵力的理解是:“必须从精神实质上,不应从字面涵义上坚持和运用;必须结合理解,不能仅从文字上进行实践。”“相互支援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思想。”“在空间上保持很大间隔的部署,应做到能够相互支援。”“决不允许将现有的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两处主要海岸”^[9]。可见,虽然马汉倡导的集中理论风靡世界,但是他所提出的集中,是立足于当时美国的地缘环境从海军整体角度上考虑的,在巴拿马运河未开通的情况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相互支援的周期太长,因此要有所侧重的集中。具体落实到作战层次上,马汉对能够实现相互支援的多舰队分布式杀伤样式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为了避免后人误解他对舰队集中与分散的看法专门做出了嘱托,即从精神实质上理解,而不是从文字上执行。

2) 与科贝特的海上战争理论高度契合。科贝特的描述则比较清晰,认为海军的“集中”不同于“集结”,并直言“海军一旦集结完成之后,隐蔽性和灵活性就没有了”。集中的最好方式不是集结而是分散,“越是不拘泥于某种集中方式,越是不限定集中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就越难以阻止”。集中最为重要的含义是“围绕战略中心点实施相互间密切联系的部署”,海军集中的目的是“尽可能覆盖最广阔的海域,同时又保持着具有灵活性的相互联系,以便使覆盖海域的任一部分兵力都能根据支配意志的期望,获得有机体系内2个或更多分支的支援,首要的是能够使全体力量果断和迅速的向战略中心收缩”^[10]。所以,海军集中的方式是分散,而分散

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战斗力。

3) 与蒂尔的适度制海权理论高度契合。蒂尔是英国海军将军,他认为不存在绝对制海权,制海权仅仅是相对概念,就时间而言,制海权始终是程度的问题,就地理空间而言,制海权始终是相对的。所以,唯一有价值的制海权在于特定时间对特定海洋空间的控制和运用,而这种控制和运用的范围即为军舰战斗力所覆盖的区域。蒂尔引用一战时英国海军上将培根的话“制海权仅限于战列舰所及之处”^[11]。分散的舰队能够极大的拓展海军兵力的战斗力覆盖空间,从而达成最重要的海战目的——运用制海权。

2.2 “分散编成”兵力运用样式符合海上作战客观环境

一个军事理论只有符合该种战争所处战场环境的客观规律才是现实的、正确的,不是清谈的、空泛的。长期的和平容易导致海上兵力的集结作战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关历史告诉我们,对成功越是有把握,集中的方式就越是分散,只有当兵力部署超出了军队能够相互支援的底线时,分兵才是糟糕的。分散编成作为一种兵力编成样式,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都有其实用意义,但是在海洋中有着更加突出的作用。

1) 在海洋中,战略展开是提供有效威慑力的最佳方式。海洋与陆地的不同在于海上航行没有任何障碍,兵力间的相互支援都是以直线相连,不需要陆地上的交通线,因此海军更容易集结,这也导致了海军的分散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分散而能够互相支援的舰队能够对敌人更加广泛的区域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想击败我方任一舰队,他面对的将是我方的全部舰队。在英国与拿破仑作战的1805年,英国通过在英吉利海峡、加的斯海域、地中海3个海域分别部署不同规模的舰队,将法国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海域分割封锁,使拿破仑耗资巨大的舰队不敢出海。因为一旦某一支法国军舰出海,英国便可以迅速的集中起两只舰队来应对法国的一支舰队,如果多支法国舰队同时出海试图集结,英国会先于他们集结,因为英舰在外海,而法舰在港内,同样的集结路线情况下英舰的航程要比法舰短的多。科贝特称这种布势为“立于不败之地”,英国以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力量实现了对法国的完全震慑。当前美国海军在我当面海域纵向上分岛链布势,横向上联结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迪戈加西亚,也是分兵威慑的体现。

2) 在海洋中,分兵集火是提供攻击力的最佳方

式。在海上,舰艇如果同时面对多个方向的威胁将是致命的,陆地上的环形工事或者堡垒抗击在海洋中是不存在的,同时面对多个方向威胁的舰艇面临的不仅仅是抗击能力的问题,更有指挥混乱的问题,因为一艘舰艇仅仅是一个作战单元。所以,历史上许多著名海战中,获胜的一方都将己方编成了2队,一来方便集中火力,二来不至于己方过于分散加大协同难度、失去统一指挥。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己方分散的舰队首先对敌方主力实现多个方向的火力打击,后期再将对方切割的更加分散使敌方指挥混乱,使己方开始时保持分散对集中的火力优势,后期保持分散对更加分散的指挥优势,从而获得胜利。如甲午海战中的日军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英军,而他们的对手北洋水师和法军则都只列成了一队。这里并不是指两场战争成败的根本原因在此,而是指在达成集中火力这个目的上,兵力的适度分散才能使火力更加集中,而火力的集中程度往往关乎海战成败。

3) 在海洋中,分散兵力是提供防御力的最佳方式。分散兵力无法提供战术上的防御,而是提供战略上的防御。所谓战略上的防御,即我方分散的兵力使对方的主力舰队没有抓手,使其感到打击任何一个都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并且面临被我方能够相互支援的舰队围歼的危险,因此会使对方指挥官犹豫不决。在这个犹豫的过程中,我方则一直在自由的使用着海洋。分散的兵力通过使我方某一支舰队面临威胁,来换取大部分舰队的安全,同时这一舰队面临的威胁也会大大降低,因为对方面临决策危机。正如日德兰海战,德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战术上略胜英军一筹着实不易,但是此役后德国并没有获得北海的制海权,而是退回了国内。以至于后世有人评论“德国就像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出门把狱卒打了一顿,自己又走回了监狱”。德国之所以“自己又走回了监狱”,实在不是主观愿望,而是出去以后到处都是狱卒,即使能够一个一个地打败,己方的损失也不是面临严重陆上威胁的德国所能承受的,所以只能自己走回了监狱。

2.3 分布式杀伤对军队装备技术发展的需求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相匹配

关于战争时代的划分方法有许多种,按照武器装备的划分最权威也最广为认知,例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火药时代、机械化时代等,这是因为武器装备的水平是决定战争理论、战争形态的最大客观因素。因此,

检验一个军事理论所处的时代,最好的方法就是检验该理论对装备的需求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如果需求的是上一个时代的武器,则是落后的理论;如果需求的是当代的武器,则是当代的理论;如果需求的是符合科技发展前景的未来武器,则是未来作战的晨曦。分布式杀伤就是未来的理论。

1) 在攻击能力上,距离远、速度快、精度高的要求与导弹等主战武器的发展前景相匹配。分布式杀伤所指的舰队分散编成,不再是几海里或者几十海里的分散,而是使相隔几百海里甚至是上千海里的舰队能够实现互相间的增援,这就对主战武器尤其是未来舰载导弹等武器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速度快、距离远、精度高。导弹发展所展现出来的有以下前景:发动机推力的增大导致速度越来越快;燃料的越来越高效致使推进效率变高,航行距离变远;光电红外复合式传感技术、基于图像的跟踪系统和数字化数据链等新的引导方式导致精度越来越高;导弹的临近空间技术越来越成熟,可以同时增大距离与速度。

2) 在通信能力上,距离远、衰减弱、储量大的要求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相匹配。分布式杀伤对通信的要求不仅是传输距离远,还能突破介质,实现水下与水面通信,甚至是水下与空中通信的要求,并且分布式杀伤需要信息不间断的传输,传输内容多,所以对通信储量要求很高。量子通信技术的巨大优越性已经在逐步显现,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是量子纠缠,在理论上能够突破时空维度的限制;西方科学家将量子通信描述为水下GPS,有了它,潜艇可以如水面舰艇一样通信;由于量子通信的信息传输量不再受到发射电台的功率限制,所以可以改善水下通信受制于波长和功率的现状。

3) 在侦察预警能力上,反应快、精度高、全时覆盖的要求与侦察预警技术的发展前景相匹配。要想控制住广阔的海域,有力有效的侦察预警能力是第一要务。反应必须要快,任何进入侦察预警范围的目标必须引起“分布编成”体系内全体作战单元的共振;精度必须要高,分布式杀伤的几乎所有攻击都是超视距的,载入武器攻击参数的数据仅仅来自于侦察预警体系;感知持续时间必须要长,尽量做到全时覆盖,一旦有了时间上的漏洞,让对方兵力能够抓住机会渗透,整个体系就有被破击的隐患。侦察预警技术的发展前景可以概括为空间上的立体化、技术上的自动化、手段上的综合化。空间上的立体化即为陆、海、空、天、电、网多领

域的侦察,对各个领域可能面临的入侵都有侦察预警能力,同时各个领域间能够相互联系、相互通报、共同分析,实现快速反应与高精度;技术上的自动化使侦察预警体系内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不知疲倦的情报信息网络进行实时监控,以实现全时覆盖,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分析转型也在朝着“基于对象生产情报”的高精度迈进^[12];手段上的综合化即国家情报体制、战略预警体制与海上编队的战术预警体制相结合,对可能遗漏的信息进行补充,并从战略预警中推导出战术预警的重点和方向。

3 实施分布式杀伤需要建设的能力

3.1 信息化作战能力是“分布”能够联动的关键

确保兵力分散配置不是劣势而是优势的最关键因素是使分散的兵力能够相互联动支援,而这来自于信息化作战能力。

1) 立体多维的战场感知能力。任何战争都以战场感知为基础,智能化战争以全维战场感知为基础^[13]。战场感知能力是庞大地理空间中广泛分布的海上兵力得以生存的前提,破击一个体系,只需要找到一处漏洞即可。分布式杀伤的战场感知不能仅仅依靠海上兵力,而是整个国家的态势感知力量需要对陆、海、空、天、电网等领域实施全域覆盖。在战场感知上实现岸基与海上的结合、军种间的结合、国家情报能力与军队预警能力的结合。分布式杀伤虽然庞大,但是其背后必须有更为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从这个角度讲,分布式杀伤也是“大体系支撑下的小作战”,并且外围体系越大,分布式杀伤显得越小,才能使其越安全,越得心应手,发挥的战略能力越大。

2) 跨越军种的指挥通信能力。没有通用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信息化,各军种之间指挥通信系统不配套是让美军很头疼的问题,也是美军参联会和各战区盯住的重点工作。要在组织体制和军工体系内大力破除权力和利益藩篱,将提升作战能力的需求作为军队装备工作的唯一导向,统一海上兵力的通信系统,畅通联合指挥链条,使各军种的海上作战兵力真正成为一个整体。

3) 有力有效的电子对抗能力。分布式杀伤的信息作战能力一旦瘫痪,分散配置的兵力便成了分散各处的标靶,因此其电子对抗能力必须有力有效。全面提升电子对抗侦察、电子干扰、电子防御和反辐射摧毁能

力。在作战前就争取对对手的电子对抗能力和指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做到先期发现、以攻为守,同时增加系统的自适应能力以确保生存。

3.2 单元作战能力是“杀伤”得以实现的前提

要想分布的舰队能够实现有效杀伤,必须保证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对方倾泻“确保摧毁”的火力,同时加强单元自身防护能力和作战单元防御整个体系的能力。

1) 确保摧毁的火力打击能力。水面舰艇、航空兵和潜艇的火力打击能力需要持续改进,加强注重认知/动态的智能化制导武器研究^[14],注重电磁能、激光武器、超空泡等颠覆性装备技术的研发,争取实现对强敌的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同时完善杀伤数据链系统,缩小“从发现到摧毁”的时间,增加作战效率的同时确保自身安全。

2) 基于模块的一体化战术能力。将作战单元的战术能力“打包”,更加便于作战单元战术能力的准确指挥和精确释放。以注重整合平台的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NIFC-CA)为例^[15],反舰导弹来袭时,整个舰艇能够根据一个指令做出所有应当做的动作。一旦下达远程防御指令,远程防空导弹预备点火、全舰警铃自动响起、水密门限时自动关闭、中近程防空武器自动进入备战状态,人员仅仅实施监督作用,并能够有干预计算机的权限,而不是指令一下全舰人员依靠人力跑到站位进行各种操作。

3) 基于指令的灵敏反应能力。分布式杀伤背景下,处于外围的兵力受到直接威胁的可能性减少,对方最有可能直接打击我方核心兵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围兵力任务轻松,相反,体系的存活取决于外围兵力的灵敏反应能力。现在的兵力做出反应主要基于自身侦察预警所获信息,而在分布式杀伤的未来,兵力更多的只能收到其他兵力发来的指令,自身是无法探测到任何端倪的。这就需要装备和人员适应这种基于指令的作战,同时对舰载计算机系统的运算分析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3 形成体系作战能力才能确保分布式杀伤

提升单元作战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的目的是使各个单元合众为一,形成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基本形式,无论是信息主导、联合制胜还是精确打击,其基本形态都是构建体系,作战目标都是破击体系,分布式杀伤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体系作战形态。

1) 各作战单元互联互通,实现能量的联动聚合。各作战力量之间的协同一致是有效发挥体系作战效能的重要条件^[6],而协同一致的首要前提就是互联互通。要注重资源共享,实现海上多军种的信息共享与指挥共享,其中首先应当做的是情报资源共享,将各单元的感知能力聚合为体系的感知能力,以感知能力为抓手,牵引火力打击、战场防御等能力的聚合;实施一体化指挥,首先实现海上作战指挥系统硬件的一体化,改变以往各军、兵种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组织建设、自己内部使用的状态,为海上一体战的实施创造前提。各单元互联互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方便通信与指挥,其实质是将各单元的能力通过信息化手段联通在一起,实现能量的集聚。

2) 各作战单元目标一致,实现能量的精确释放。广泛空间内大量兵力的能量聚合起来,只有有重点的释放,才能发挥出体系大于个体的优势。在火力打击能力方面,注重多种打击能力的协同,实现“面对点”“体对点”的杀伤,缩短打击时间、提高打击密度,促进协同方式由舰、机、潜的平台间协同向不同平台发射的武器能够实现武器间协同的革命性转变;防御能力方面,通过分布式杀伤的外沿兵力极大的扩展防御纵深和立体防御能力,使各单位防御的空间和能力互为重叠和补充,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和领域袭击,我方都有一定规模的兵力实施防御,能够迅速针对受威胁方向实施有力的积极防御,实现“面对点”“体对点”的防御,使敌人无法在不消灭我方外围兵力的情况直击核心。

3) 各作战单元各司其职,实现体系的能量放大。体系能力的强弱可以应用“反木桶原理”来分析:以对空防御能力为例,体系的对空防御能力并不取决于体系中防御能力最弱的兵力,而是取决于体系中对空防御能力最强的兵力,我们只需要通过合理部署此兵力使其覆盖整个体系即可。得到的启示是,要想体系发挥出 $1+1>2$ 的效果,则要在舰艇平台的针对性上下功夫,不能过度追求单一类型舰艇的综合能力。要增加基于同一舰艇平台的不同舰种,同一种类型的舰艇可以根据武器装备侧重点的不同研发出多种型号,有的注重对陆打击、有的注重反舰、有的注重防空或者反潜。在分布式杀伤这样一个体系中,只有各自有所侧重,才能实现能力聚合与放大,作战单元的综合化只能带来体系能力的平庸化。

4 结论

分布式杀伤这一作战概念,是随着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前景与海上战争基础理论的有机结合体,是信息化海军发展的必然选项,也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的题中之义。分布式杀伤是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的海上部分,集中体现了以体系为基础、以信息为主导的现代海战理念。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分布式杀伤概念并不是一定要跟随美国海军亦步亦趋,也并不否定非对称作战思想,而是需要把握其理论精髓和科技要素,着眼体系、强调信息,在客观规律的指导下统筹实事求是与创新驱动的关系,走出一条自主发展、创造性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李洪兴. 分布式杀伤舰队的作战舰艇 LCS[J]. 现代军事, 2015(8): 17.
Li Hongxing. Warship LCS of distributed lethality fleet[J]. Modern Military, 2015(8): 17.
- [2] 李峥, 王燕. 分布式杀伤与未来海战[J]. 国际电子战, 2015(11): 16-19.
Li Zheng, Wang Yan. Distributed lethality and future naval warfare[J].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Warfare, 2015(11): 16-19.
- [3] 王璐菲. “分布式杀伤”概念面临的挑战[J]. 防务视点, 2015(9): 20.
Wang Lufei. The challenge of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ed lethality"[J]. Defense Point, 2015(9): 20.
- [4] 王璐菲. 美海军防空新概念: 由分层作战转向“分布式杀伤”[J]. 防务视点, 2015(4): 58-60.
Wang Lufei. New concept of US navy air defense: From stratified operations to "distributed lethality "[J]. Defense Point, 2015(4): 58-60.
- [5] 齐浩然, 谢坤生. 水面部队战略: 重返海上控制[J]. 海军译文, 2017(2): 1.
Qi Haoran, Xie Kunsheng. Surface force strategy: Return to sea control[J]. Navy Translations, 2017(2): 1.
- [6] 吴勤. 美军分布式作战概念发展分析[J]. 军事文摘, 2016(13): 44-47.
Wu Qin. Analyse of American military distributed combat concept[J]. Military Digest, 2016(13): 44-47.
- [7] 马晓晨, 白旭尧. 美海军分布式杀伤概念及其落实情况[J]. 现代军事, 2017(4): 56.
Ma Xiaochen, Bai Xuyao.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ed lethality of US navy and its implementation[J]. Modern Military, 2017(4): 56.
- [8] 黄峻松. 美海军新战略融合美英海权理论[J]. 当代海军, 2017

- (10): 60–63.
Huang Junsong. US navy new strategy is compromising US&UN sea power theory[J]. Navy Today, 2017(10): 60–63.
- [9] 艾·塞·马汉. 海军战略[M]. 商务印书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Alfred Thayer Mahan. Navy Strategy[M]. Commercial Press,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 [10] 朱利安·S·科贝特. 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M]. 仇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Julian Stafford Co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M]. Qiu Hao,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11] 杰弗里·蒂尔. 21世纪海权指南[M]. 师小芹,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Shi Xiaoq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12] 胡向春. 大数据时代的防务情报分析[J]. 现代军事, 2016(2): 99.
Hu Xiangchun. Analysis of defense 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J]. Modern Military, 2016(2): 99.
- [13] 蔡明春, 吕寿坤. 智能化战争形态及其支撑技术体系[J]. 国防科技, 2017, 38(1): 94.
Cai Mingchun, Lü Shoukun. The form of intelligent war and its supporting technology system[J]. Defense Technology, 2017, 38(1): 94.
- [14] 蒋琪, 申超, 张冬青. 认知/动态与分布式作战对导弹武器装备发展影响研究[J]. 战术导弹技术, 2016(3): 1–6.
Jiang Qi, Shen Chao, Zhang Dongqi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dynamics and distributed operations on missile weapon equipment development[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16(3): 1–6.
- [15] 刘维国, 刘晓明, 王一琳, 等. 美国“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发展研究[J]. 战术导弹技术, 2017(2): 21–25.
Liu Weiguo, Liu Xiaoming, Wang Yilin, et al.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NIFC-CA” system[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17(2): 21–25.
- [16] 王伟, 刘付显, 范成礼. 分布式协同作战一致性建模[J]. 火力与指挥控制, 2017, 42(10): 118.
Wang Wei, Liu Fuxian, Fan Chengli. Conformance modeling of distributed cooperative operations[J]. Fire Control And Command Control, 2017, 42(10): 118.

Distributed leth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warfare

HUANG Junsong

Naval Command College,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US military is at the forefront in the field of the world maritime war theory.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war form and the maritime war theory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tributed Lethality of the US nav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distributed destruction and the intelligent war is analyzed to see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maritime war and to confirm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ed Lethal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stributed Leth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war.

Keywords distributed lethality; maritime warfare; combat capability ●



(责任编辑 傅雪)